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资本论》的辩证方法与当代阐释

迪拉热·艾依拉提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7月17日；录用日期：2026年8月9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18日

摘要

马克思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为核心辩证方法搭建《资本论》的科学体系，实现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根本超越，达成了历史、逻辑与现实的辩证统一。本文回归《资本论》原典文本，厘清该方法的科学内涵与运行逻辑，还原其从商品逻辑起点经多重要素中介最终再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体的完整过程，并进一步选取平台经济中的数据商品化现象作为典型案例，完整演示该方法从抽象范畴出发逐步展开、把握具体经济形态内在运行机制的分析路径，挖掘其在数字经济语境下的当代阐释价值，确证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回应时代课题的核心思维支撑作用。

关键词

《资本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辩证方法，数据商品化

From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 The Dialectical Method of *Capital* and Its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Dilari Ayiratti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ly 17, 2026; accepted: August 9, 2026; published: August 18, 2026

Abstract

Using the dialectical method of “ascending from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 as its core, Marx constructed the scientific system of *Capital*, thereby achieving a fundamental transcendence of Hegel's

idealist dialectics and realizing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history, logic, and reality. This paper returns to the original text of *Capital* to clarify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operational logic of this method, reconstructing the complete process through which it proceeds from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commodity, via multiple mediating elements, to the eventual reproduction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s a totality. Furthermore, by selecting the phenomenon of data commodific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s a typical case study, this paper thoroughly demonstrates the analytical pathway of this method—unfolding progressively from abstract categories to grasp the intrinsic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a concrete economic form—and excavates its contemporary interpretive value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reby confirming its role as the core intellectual underpinning of Marxism in responding to the issues of our time.

Keywords

Capital, From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 Dialectical Method, Data Commodific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其伟大不仅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更在于创立了科学的辩证方法论([1], p. 24)。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提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将其作为建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核心逻辑。这一方法并非马克思的主观臆造，而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理论把握，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在当代语境下，资本主义进入数字资本、金融化、全球化深度发展的新阶段，出现了平台垄断、数据异化、零工经济等新现象，传统的经济分析框架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重释《资本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方法，以具体的当代数字经济现象为载体演示方法的实际运用路径，挖掘其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当前学界围绕《资本论》辩证方法的相关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值得反思的认知偏差：一部分研究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窄化为单纯的文本叙述方法，剥离了其背后的历史唯物主义根基，把《资本论》的范畴推演等同于黑格尔式的纯概念运动，消解了这一方法直面现实生产关系的批判力量；另一部分研究则直接将其降格为普通的形式逻辑工具，忽略了其从萌芽性的简单矛盾出发，逐步展开复杂社会有机体的辩证本性，错失了《资本论》方法体系中“历史－逻辑－现实”三者统一的核心特质。

这两种偏差共同导致的结果是，不少当代研究在运用《资本论》的方法分析数字资本、平台经济等新现象时，要么陷入纯粹的概念思辨，无法切入新的资本形态的内在运行机制；要么停留在碎片化的现象描述，难以穿透表层表象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层矛盾。本文重新回到《资本论》的原典语境，厘清核心概念的明确定义，还原“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方法的完整生成逻辑与辩证本性，聚焦剖析马克思在逻辑推演环节的范畴选择依据，打破过往两种认知偏差带来的理论局限，并以数据商品化现象为样本完整演示该方法的分析过程，为激活《资本论》辩证方法的当代解释力搭建可靠的理论桥梁。

2.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内涵

2.1. 方法论理论渊源与根本超越

黑格尔的辩证法为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提供了理论来源，不过，两者在本质规定上

具有根本差异。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提出“具体概念”的思想，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视为思维自身的运动过程，认为具体是思维的自我展开和自我规定，是绝对理念的辩证发展结果[2]。在黑格尔那里，“感性具体”是思维的起点，经过抽象环节，最终达到“思维具体”，但这一过程是脱离现实的纯思维运动，将现实世界视作思维的表现，从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的误区。

马克思虽从黑格尔辩证法中承袭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但他批判性地改造了其合理内核，摒弃了黑格尔将现实世界视为思维外化的唯心主义立场，转而将此方法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之上。马克思指出：“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3]这一论述明确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根本分歧。

马克思的方法论创新在于，将辩证法与唯物主义认识论相结合，确立了“感性具体－抽象－思维具体”的辩证认识路径。感性具体是认识的起点，是对现实事物的准确把握，具有混沌性和整体性；抽象，就是对我们感知到的具体事物进行加工：去掉那些偶然的、不重要的特征，只提取出共同的核心特征，从而得出一个基础性的概念；思维具体则是在抽象的基础上，通过范畴的辩证运动，将现实事物的矛盾关系整体再现于思维中，实现对事物本质的全面把握。这一路径既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又体现了辩证法的发展观，实现了认识论与辩证法的统一。

2.2. 方法论的核心要素：起点、中介与终点的辩证统一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科学认识方法，其运作机制内含三个不可分割的要素：逻辑起点要合理，中介环节要辩证，思维终点要具体。三者既相互牵制又相互支撑，共同统一于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之中。

逻辑起点的合理性是该方法有效运行的前提。马克思认为，逻辑起点必须是“最简单、最普遍、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是“构成整体的基本单位”，同时必须包含“一切矛盾的胚芽”[3]。这意味着，逻辑起点的抽象不是任意的抽象，而是“适度抽象”：既逻辑起点的抽象层级必须保持在合理边界内，既不能抽象到丢失研究对象的特有本质属性，也不能具体到裹挟过多非本质的偶然性要素，最终提炼出的范畴必须是研究对象范围内“最简单、最普遍、最基本、最常见、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同时包含该研究对象全部矛盾的胚芽，成为支撑后续全部逻辑推演的基本单位。选择“商品”作为《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并非偶然。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普遍的经济事实，也是其经济生活的基本要素；而它自身所固有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冲突，已囊括了资本主义全部矛盾的胚芽，足以支撑起后续整个范畴系列的逻辑生长[4]。

中介环节的辩证运动是连接起点与终点的关键。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不是抽象范畴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中介环节的矛盾运动实现的。每一个中介范畴都既是前一范畴的矛盾展开，又是后一范畴的抽象前提，形成“抽象－中介－具体”的逻辑链条。在《资本论》中，从商品到货币、从货币到资本、从资本到剩余价值、从剩余价值到利润、利息、地租，每一个范畴都是中介环节，都体现了矛盾的深化与发展[5]。

思维具体的整体再现是该方法的终点，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三步实现了这一目标：先分析生产，再分析流通，最后分析生产总过程，三部分融为一体，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在思维中整体呈现。

2.3. 方法论的本质特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本质上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逻辑的展开必须以历史的发展为基础，逻辑范畴的先后顺序必须与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相一致；同时，逻辑是对历史本质规律的升华和归纳，

并不是对历史的简单复制。

《资本论》里从商品到货币、从货币到资本、再从资本到剩余价值这一串范畴的推进，跟现实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是一致的：商品交换先于货币出现，货币先于资本出现，资本的出现标志着简单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转变。同时，马克思的逻辑展开又不是对历史的机械追随——例如在分析价值形式时从最简单的形式入手，通过逻辑分析揭示价值形式发展的内在规律，这种分析超越了历史的具体细节，但更深刻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本质。

3. 《资本论》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展开逻辑：范畴选择的方法论依据

3.1. 逻辑起点选择的方法论依据：商品范畴的辩证合理性确立

作为《资本论》以“商品”作为逻辑起点，绝非马克思主观任意的选择，而是完全依据“适度抽象”这一核心准则，对范畴进行提炼的结果。从方法论层面看，这一选择的依据体现在两个维度：第一，完成对大量感性具体的去粗取精，舍弃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各类碎片化的、偶然的非本质要素，将抽象边界严格限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本质层面，既没有过度抽象到剥离掉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属性，也没有保留过多具体的次要经济细节，由此最后得到的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普遍的“细胞形式”；第二，这一起点范畴须包括研究对象全部矛盾的种子。商品中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其根基在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而此矛盾足以孕育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续的全部矛盾，为后续所有范畴的展开提供自洽的逻辑依据。正是基于这一严谨的方法论筛选，商品范畴才成为支撑整个《资本论》体系的稳固逻辑起点。

3.2. 中介环节推进的方法论依据：矛盾的逐层外化与范畴的有序过渡

从商品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思维具体，是通过一系列中介范畴的辩证运动实现的，每一个中介范畴都标志着矛盾的深化和认识的推进。这一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商品向货币的转化、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分配。

第一阶段，商品向货币的转化。这一转化的方法论依据在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在物物交换中无法得到解决——商品必须找到一种能够表现自身价值的“等价物”。货币的产生，是交换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种特殊商品逐渐从众多商品中独立出来，承担起一般等价物的职能。货币的产生，将商品内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之冲突，外在地展现为商品一方与货币一方之间的对立。马克思之所以选择货币作为第二个范畴，是因为货币既是对商品矛盾的“解决”（价值获得了独立的存在形式），又是对商品矛盾的“深化”（由于货币的介入，买与卖被拆分为时空上相互独立的行为，这便为经济危机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第二阶段，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这一转化的方法论依据在于：货币本身不是资本，但货币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资本。马克思通过对资本总公式($G-W-G'$)的分析，揭示了货币向资本转化的秘密：资本总公式的矛盾在于——“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6]。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解决这一矛盾的钥匙就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家按价值付酬购买劳动力，而劳动力的使用却能创造出超出其价值的余额。货币向资本的转化之所以必要，在于它标志着从“买以卖”到“卖以买”的目的逆转，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由此质变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第三阶段，资本主义矛盾的全面展开，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产出、兑现与分割；而这一过程本身，也正是“从抽象到具体”方法在理论上的逻辑延伸。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从生产入手，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作日或提高劳动生产率，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1]，p. 366)。在第二卷中转向流通：剩余价值的实现必须通过资本的循环和周转，只有在流通领域中完成商品的销售，

剩余价值才能从观念上的价值转化为现实的价值[7]。在第三卷中进入总过程：剩余价值在不同资本家集团之间分配，转化为利润、利息、地租等具体形式，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8]。这一顺序不是随意的，而是遵循了“从本质到现象”的辩证逻辑——剩余价值是本质，利润、利息、地租是其转化形式。

3.3. 逻辑终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思维具体

《资本论》的逻辑终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思维具体，这一思维具体通过三卷的逻辑展开，全面再现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揭示了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等相互作用的经济规律。这些规律不是外在相加的，而是通过范畴的辩证运动从一个共同的内核——剩余价值——中逐步展开出来的。

4.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运用：以数据商品化现象为分析案例

4.1. 第一步：确立分析数据商品化现象的适度抽象逻辑起点

遵循“适度抽象”的核心要求，首先就是对平台经济领域繁复的感性具体完成抽象提炼，舍弃平台算法设计、数据存储技术、界面交互形式等非本质的技术类非核心要素，将分析的逻辑起点确定为“原始用户数据”。再从方法论角度来验证这一起点的合理性：原始用户数据是平台中最普遍、最常见的存在，平台会根据用户每一次的点击、浏览、社交、交易行为来生成庞大的原始数据，这些原始数据是构成整个平台数据产业链的基本“细胞”。同时原始数据本身就包含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潜在矛盾，其使用价值体现在可以用于用户精准内容推送、用户画像勾勒、商业决策优化等用途，而其价值则体现在用户的数字劳动过程之中，这一矛盾正是数据商品化全部复杂矛盾的源头，完全符合逻辑起点的选择标准。

4.2. 第二步：通过多层中介环节逐层推进矛盾展开

以原始数据作为整个分析过程的逻辑起点，顺着内在矛盾不断向外显现的脉络，逐层引入过渡性范畴，完整梳理数据商品化的整套运作过程。

第一层中介，是原始数据加工形成标准化标注数据集。零散、无固定结构的原始数据本身不具备直接商用的条件，平台会借助数字化处理技术，对海量杂乱的原始信息做脱敏、分类与人工标注处理，把碎片化、无统一格式的基础数据，改造成能够适配算法运算的标准化数据集合。经过这一步转化，原始数据中潜藏的使用价值得以落地，能够被资本投入商业运作；数据承载的价值也不再单纯隐藏在用户日常行为劳动之中，额外叠加了数据清洗、标注环节的人工劳动，至此数据初步拥有商品的基础特征。

第二层中介，由标准化数据集延伸至平台层面的数据要素流通。加工完成的标准化数据不会仅局限于单一平台内部使用，而是借助线上数据交易市场、平台合作共享协议、第三方数据服务商等多种渠道流入流通环节。各类平台、商业经营主体通过交易换取自身业务所需的数据资源，数据的价值借助交换行为获得社会层面的认可，数据也由此从单纯劳动加工产物转变为成熟商品，数据商品化的核心形态就此形成。

第三层中介，从进入流通的数字商品推进至依托数据实现剩余价值的生产与收益分配。流入市场的数据商品会持续投入平台再生产环节：企业依靠精细化用户数据优化算法推荐机制、提高流量变现能力、发展定向营销业务，凭借数据要素获取传统行业难以企及的超额经营利润，数据商品的使用价值成为资本快速增值的关键依托。顺着这一逻辑继续推演，平台投资方、数据服务机构、广告经营方等多方主体会依照各自参与环节分割经营收益，数据商品化自带的内在矛盾也随之外化，衍生出平台市场垄断、数据权属纠纷、用户个人信息权益受损等现实经济问题，数据商品化整套复杂的运行逻辑也由此完整展现。

4.3. 第三步：抵达思维具体，完整把握数据商品化的整体运行本质

经由上述多层中介范畴的递进推导，我们能够在理论认知层面完整还原数据商品化这一新兴数字经济现象的全貌。数据商品化不能简单看作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结果，本质是数字经济环境里，资本吸纳用户线上劳动、以此实现自身价值扩张的特殊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在拓宽传统商品经济发展范围的同时，也催生了数字场景下独有的各类经济冲突。借助这套分析思路，我们得以深入挖掘该经济现象的内在本质，突破以往相关研究只侧重技术表层描述、缺少深层经济逻辑剖析的不足。

5. 结论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立的科学辩证方法，其本质是历史与逻辑、思维与现实的有机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这一方法通过合理的逻辑起点、辩证的中介环节、具体的思维终点，构建了完整的范畴体系，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

在当代语境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解释力。本文选取数据商品化作为具体案例完整演示了该方法的分析路径，证明该方法能够穿透数字经济的现象迷雾，准确把握数字资本新形态的内在运行机制，为分析平台经济新形态提供科学的思维路径。同时，在当代阐释中，我们要坚持抽象范畴的现实性、逻辑运动的辩证性、思维具体的开放性，不断拓展该方法的适用边界，避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

总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不仅是理解《资本论》科学体系的钥匙，更是理论研究回应时代问题、彰显实践品格的核心方法论支撑。在新时代的理论研究中，坚持和发展这一辩证方法，能够为剖析数字时代的全新经济现象、解释当代社会的新矛盾新问题提供可靠的科学思维工具。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2] 黑格尔. 逻辑学[M]. 先刚,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7]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8]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